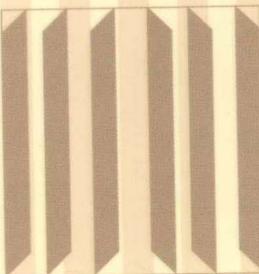


# 对外开放的 酝酿与起步

(1976~1978)

*The Fermentation and Start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1976~1978)*



李妍 / 著



社会 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对外开放的 酝酿与起步

( 1976~1978 )

李 妍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 (1976 ~ 1978) /李妍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

ISBN 978 - 7 - 5097 - 0256 - 7

I. 对... II. 李... III. 对外开放 - 研究 - 中国 - 1976 ~  
1978 IV. 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5317 号

## 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1976～1978）

---

著者 / 李妍

---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85117872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经理 / 武云

责任编辑 / 张峰 李天明

责任校对 / 武家利

责任印制 / 岳阳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3.5

字 数 / 226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256 - 7/D · 0103

定 价 / 33.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李妍的博士论文要出版了，我非常高兴。她让我写一个序言，我作为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义不容辞。

对外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决策。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0 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对外开放的决策并不是突然做出的。从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外开放就已经在逐步酝酿和起步了。没有这个酝酿和起步，也就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然而，对这个酝酿和起步的过程，学术界、理论界很少有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对外开放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李妍在做博士论文时，正是看到研究中的这个缺陷和不足，决心以此为题做她的博士论文。她的博士论文着重分析 1976 ~ 1978 年间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其核心内容包括：本时期对国外状况的考察；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有条件地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和合作等。她认为，这是对外开放处于酝酿和起步时期的主要内容。在结束语中，她对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的对外开放做出了总体评价，认为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了一些成效，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做了准备。当然，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经济规律，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总结，她概括出了几个经验和教训，并得出结论：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因为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很少，所以李妍在写博士论文时，不能不建立独立的研究体系和框架，以进行系统的论述和总结。为了写清楚这个时期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她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收集原始资料，对《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经济导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国际问题专题研究》、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中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力图再现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她的这些努力，是应该肯定的。

当然，由于本课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资料特别是第一手原始资料的缺乏，以及作者研究和写作功力的限制，文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有的地方说得还不是很清楚，这是需要作者继续深入研究的。我相信，只要作者继续努力，肯定会取得可喜的成果。

郭德宏

2008年3月20日于北京

# 目 录

导 言 .....	1
<b>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历史追溯 .....</b>	<b>16</b>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 .....	16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 .....	21
第三节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间的对外交往 .....	28
<b>第二章 对外开放起步的历史背景 .....</b>	<b>42</b>
第一节 国际局势的变化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创造 了条件 .....	43
第二节 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加快与西方的接触 .....	47
第三节 中国外交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	52
第四节 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关系的变化 .....	59
<b>第三章 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 .....</b>	<b>68</b>
第一节 中国代表团的出国考察 .....	68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出国考察的特点和收获 .....	86
<b>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酝酿 .....</b>	<b>97</b>
第一节 关于对外开放的探讨 .....	97



第二节 中央领导层关于对外开放思想达成的共识	118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引进外资的探索	129
<b>第五章 1976～1978 年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b>	<b>141</b>
第一节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情况	142
第二节 关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思考	159
<b>第六章 1976～1978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b>	<b>170</b>
第一节 1976～1978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171
第二节 1976～1978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178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关系	197
第四节 中国内地同港澳地区的贸易关系	205
<b>第七章 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和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事务合作</b>	<b>209</b>
第一节 1976～1978 年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	209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事务合作	224
<b>结束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b>	<b>231</b>
<b>参考文献</b>	<b>255</b>
<b>后 记</b>	<b>261</b>

# 导　　言

---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开放性的不断扩大，经济资源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实力的增长，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先进技术，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要发展、要立于世界的前列，必须开展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进一步地对外开放。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sup>①</sup>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放在国际环境中来考察，放在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中来考察。

江泽民也多次强调对外开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 199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讲到对外

---

<sup>①</sup>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64 页。

开放时指出，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sup>①</sup>。在2002年的“5·31”讲话中，江泽民又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sup>②</sup>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指出，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sup>③</sup>。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对外开放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sup>④</sup>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07年9月28日下午进行了第44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①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26～27页。

②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people.com.cn>，2002年5月31日。

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531页。

④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http://www.chinanews.com.cn>，2005年10月11日。

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sup>①</sup>

今天，对外开放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达成了共识：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实行对外开放为我们解决现代化建设中资金短缺和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提供了必要条件；实行对外开放为我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提供了条件；实行对外开放为我们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提供了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了解世界信息，掌握世界跳动脉搏的重要条件；实行对外开放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要条件。<sup>②</sup>

对外开放二十多年来，在党中央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全方位，是指我国的对外开放要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不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要实行开放政策。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就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沿边和沿江地区及内陆省区，按照不同的开放程度所形成的梯次展开的开放格局，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对外开放。宽领域的对外开放表明，我国不仅经济领域实行对外开放，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领域也都实行对外开放。在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中，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我们进行对外开放的重点。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2006年，我国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对外贸易总额高达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净增

<sup>①</sup> 《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http://www.chinadaily.com.cn>，2007年9月30日。

<sup>②</sup> 参见徐志宏、秦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73～176页。



3387.8亿美元，增长23.8%，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增速连续5年保持在20%以上。2006年我国外贸一大特点是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3.6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同比回落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显示，2006年12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6%，其中出口941亿美元，增长24.8%，进口731亿美元，增长13.5%。<sup>①</sup>

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更加注意“积极有效”，实现了从“来者不拒”到“择善而从”的转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形势下，对于纷至沓来的外商投资，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我所用。一味地狭隘拒斥是不可取的，同时对外商的投资也要加以甄别，设立必要的门槛，对一些不符合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项目或者做法，对一些有损于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民生等多方面和谐发展的项目应该予以限制。2006年，商务部、国资委等国家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立了必要的门槛。随着这个规定于当年9月8日起正式实施，外资并购中的种种现象得到了有效地规范，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发展经济。<sup>②</sup>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我国对外开放任务艰巨，前景广阔。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sup>①</sup> 《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1.76万亿美元》，<http://www.jctrans.com>，2007年1月15日。

<sup>②</sup> 魏声：《引进跨国公司需要科学设定门槛》，2006年8月25日第1版《国际金融报》。

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sup>①</sup>

## 二

事实上，中国走向开放的历程曲曲折折，布满荆棘。中国在历史上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它曾经以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闻名于世，为人类创造了丰硕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的对外交流也源远流长。

早在汉朝以前通过陆海两路，我国古代先民已同境外国家、民族开展了一定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现存的大量文献及考古材料表明，在夏商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已和外界发生了经济文化交流，中原与新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南亚间都有交通道路存在。《庄子·天地篇》记载，“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荀子·大略》中记载，禹曾“学于西王国”。《竹书纪年》记载帝尧时，“渠搜氏来宾”。据考证，上述文献中的昆仑山、西王国均在今新疆境内，渠搜为中亚古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高祖、惠帝到“文景之治”，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并日益走向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空前提高，其中丝织、冶铁、漆器制造业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深受中外人民喜爱的丝绸生产，汉代时高度发达，产量丰富，丝织工场规模庞大。丝织业的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早、影响重大的中外交流的典范。公元

---

<sup>①</sup>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people.com.cn>，2007年10月24日。



前138～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通西域，开辟了我国和西方的国际陆路交通道路，从此，一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境内，到达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丝绸之路”也正式开通。通过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古代东西贸易通道，从公元前2世纪到9世纪以丝绸为主的中外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沿途各地的经济繁荣，特别是对中国丝绸技术的西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隋朝的四方馆是集外交、外贸于一体的中央外事机构，其任务是“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唐朝为了给中外商人提供方便，在从长安经河西到西域的广大地带遍设驿馆，为过往的商人、使者提供食宿和牲畜的草料。唐代诗人岑参对丝路沿途驿站及丝路畅通状况有过生动描述；如“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唐朝还在长安设有礼宾院（隶属于鸿胪寺），专门负责接待外宾，每年用于外宾食宿、日用、路费等方面的费用高达13000斛。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唐朝政府于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设立了海外贸易的主管官员——市舶使，标志着自唐迄明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的诞生。除广州外，唐朝设置市舶使的港口还有明州、交州和扬州。市舶使的职能，一是对进口货物登记、分类；二是征税；三是禁止奢侈品自由交易；四是设置栈房，保管外商货物；五是管理外商在华贸易。由于鼓励对外交往，外国使节、商人、学者、留学生、僧侣纷至沓来，当时称之为“住唐”，鼎盛时竟达10万人之多。

元朝统一全国后，重建市舶司，招徕贸易，是中国历史上开设对外口岸最多的王朝。据记载，元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庆元（宁波）、温州、澉浦（海盐）和上海等七处建立舶司，掌管对外贸易。<sup>①</sup>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王朝在参照宋代

<sup>①</sup> ① 《元史·食货志》，转引自王炳林《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开放的历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第13页。

市舶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了“整治市舶司勾当”22件，又称《市舶法则》22条。此后，又不断进行修订，使其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完善的对外贸易法规。该法规明确规定了元代对外贸易的税收种类、税率；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资格、商人进出港的具体手续、商人的权益；进出口商品种类的限制；对走私的处罚等。

明朝前期，海路对外贸易创造了奇迹。从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明政府派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每次大小船只200余艘，人员2万多人，各种宝物数以万计，与亚非各国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将明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官方贸易——“朝贡贸易”推向顶峰。这种状况到明朝中后期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逐步限制对外交往，到清王朝的闭关锁国，这种限制则达到了顶峰。

公元1644~1840年的清朝前期近200年间，针对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清王朝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了明朝对外贸易的严格限制政策。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清代中国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又经历了从开海到禁海，从开海设关、多口通商到一口通商的演变过程。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活动主要由海关及十三行负责管理。公元1685年，江、浙、闽、粤四大海关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海关制度的确立。

十三行制度又称行商制度。所谓行商是指清王朝特许的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其所开商行被称为“洋行”或“洋货厅”，统称“十三行”。公元1686年，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广东地方政府将从事国内、国外贸易的商人分开，将商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清政府规定，外商到达广州后，不得自由贸易，必须首先投住到行商开设的商馆中，此后外商所有活动均在商馆内完成，因而西方商人将其在广州的贸易称为“商馆贸易”。西方商人在广州所有的贸易活动由行商代理，其行动受到行商的监督管理，行商代官府行使一定职权，所以行商又具有半官方色彩。由此可见，行商作为清政府特许的半官方的对外贸易垄断组织，成为清王

朝与外商之间的媒介、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之间联系的桥梁，这一制度限制了中外商人之间的自由贸易，成为清政府严格限制海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工具。

清政府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涉及面很广，包括贸易、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具体表现在“对开放口岸的限制，对来华外国人的限制，对国内人民出洋及与外国人交往的限制，对出口商品的限制，拒绝与西方国家建立近代的外交关系，等等”<sup>①</sup>。

纵观中国的历史，尽管数千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外交往，但这种交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男耕女织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方式，而这种农业型的经济使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他们大多数依赖自给自足，各自进行着周期性的生产和消费，这一事实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孤傲自大的心理。对这个问题，美国汉学家赖特有过如下的描述：“由于中国人在相对的孤立状态中，中国在技术、制度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不知世上尚有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抗衡的其他文明。试看陆地上东亚草原民族和野蛮民族，或者看海岸彼处较差的海岛文化，中国人有理由保持着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以中国在地理上乃文明生活的中心，第二种看法是以中国文化在一切方面优于别的民族——无论在仪式上和道德上，无论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学上，无论在人民性格的陶冶以及知识的启发上，都是优于其他一切文化。……第一种看法则结晶为‘中国’这个最常用的名词，第二种看法则见于另一常用之名词‘中华’（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sup>②</sup> 正是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使中国人大多数时间沉溺于自我陶醉之中，猛然惊醒时已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面。

①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63页。

② 转引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第49页。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西方，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地理上的发现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得以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在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产生了经济联系，这是客观现实的需要。随后的18、19世纪，在工业革命完成后，机器大工业的确立又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商品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这就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更加密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一切国家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sup>①</sup>一些走在前面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找和开发海外殖民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对古老的中国进行扩张和侵略。1515年，葡萄牙首先在中国登陆，西班牙、荷兰、英国接踵而至。

1840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一年，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历次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人估算，1840~1949年，资本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订的条约、条款多达1000个以上），大片领土丧失，巨额的战争赔款（仅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的赔款，就达白银71000余万两，加上利息，数目巨大）。<sup>②</sup>承认领事裁判权，侵略者在中

<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sup>②</sup> 朱育和：《封闭与开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第41页。